

留白

写在《秋水堂论金瓶梅》之后

田晓菲 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附片



留白

写在《秋水堂论金瓶梅》之后

田晓菲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留白：写在《秋水堂论金瓶梅》之后 / 田晓菲著. — 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8.10

ISBN 978-7-201-06038-5

I. 留… II. 田… III. ①古典文学-文学评论-中国
②文学评论-西方国家 IV. I206.2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4207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刘晓津

(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邮箱：tjrmcbs@126.com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0.375 印张 2 插页
字数：200 千字 印数：1-6.000

定价：25.00 元

目录



- 2 / 幽暗的树林(代前言)
- 2 / 从红楼到绮楼
- 12 / 留白:写在《秋水堂论金瓶梅》之外
- 26 / “田”与“园”之间的张力:关于《牡丹亭·劝农》
- 64 / 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重新发明
- 96 / 大跃侧诗话
- 126 / 隐身衣和皇帝的新装:从杨绛回忆录看“文革”中对透明度的追寻
- 146 / 半把剪刀的锐锋:重论郁达夫
- 158 / “瓶中之舟”:金庸笔下的想象中国
- 210 / 《鹿鼎记》:金庸,香港通俗文化,与中国的(后)现代性
- 258 / 走向我们已在的地方:《少林足球》、《大话西游》及其他
- 270 / 对镜:赋得艾柯近作《鲍多雷诺》
- 282 / 关于《弗里达》
- 290 / 十日谈
- 314 / 秋声赋与爱莲说(代后记)

“在三十五岁那一年,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幽暗的树林里。”但丁的《神曲》,是这样开头的。但丁的向导是前辈诗人维吉尔;但丁的旅程,是对阅读的象征。





幽暗的树林（代前言）

“在三十五岁那一年,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幽暗的树林里。”但丁的《神曲》,是这样开头的。但丁的向导是前辈诗人维吉尔;但丁的旅程,是对阅读的象征。维吉尔引导但丁,只能到炼狱为止,不能进入天堂,因为阅读是凡人的事。阅读总是在直线前进的时间里进行。时间的概念,是构成历史的要素;而只有人类才有历史,天堂是永恒不变的。

八九岁的时候,读希腊神话,留下很深的印象,因为看到神的局限,英雄的悲剧;又正是在这局限与悲剧里,展现了他们的力。

吴楚材、吴调侯的《古文观止》,是我的古汉语入门教材之一。记得最喜欢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的选段,不为别的,单只是欣赏里面的辞令:那么悠扬委婉,却又绝不肯委屈。

蔡东藩从两汉到民国的历史演义,也是那时爱读的,虽然直到多年后,才意识到,其实所有的历史,都不过是演义而已;叙述的方式和角度,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,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。

大学时读的书很杂,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,其中包括《世界史》、《圣经》。每个文明,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,了解世界和人类多一点,对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好处。《圣经》则好比一座宝库,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。我喜欢的章节有〈约伯记〉、〈雅歌〉。约伯是忠厚好人,却无缘无故遭到厄运,在他对上天的号诉里,我们听到人对自身命运的质问,对信仰的质问。〈雅歌〉是我所读过的最美的情诗

之一,写爱人“美好如耶路撒冷,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”,写爱情“如死之强大,嫉妒如阴间之残忍,众水不能淹没,大水也不能息”。

少年时看书,在书中看到的总是自己;年长后,才逐渐开始真正听到他人的声音。从另一方面来说,少年时读的书,也往往很容易被它们影响和淹没;成年以后读书,则好像平等的朋友,可以互相尊重,也更容易在这样的关系里得到乐趣。

二十八岁那年,发现了曾经弃之如敝屣的《金瓶梅》。这真是一部世界罕见的奇书。我特别钟情于绣像本:它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读者,也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小说中人。爱读《金瓶梅》,不是因为作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黑暗——要想看人生的黑暗,生活就是了,何必读小说呢——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。慈悲不是怜悯:怜悯来自优越感,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,由此产生的广大的同情。

《论语》是一部少有耐看的书。千百年后,孔子和他的弟子们,仍然如闻其声,如在目前。孔子让弟子“各言其志”,在众弟子中,孔子独独赞同曾点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这在以治国平天下著称的儒家来说,是让人惊讶的回答,但其实也许正该这样:别的弟子,只会想到自己可以“做”什么,“成就”什么;只有曾点,能够想象自己“成为”什么,“是”谁。

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社会,我一直有强烈的兴趣。这几年读得最勤的,恐怕是逯钦立编辑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,清人严可均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所谓的“二史九书”,以及《大藏经》和《道藏》里与这一时期相关的材料。读这些书的最大体会是,文本细读,应该有泛读作基础;文学史背后,应该有文化史和社会史作支柱。否则,总难免是片面的。

一系列关于欧洲手抄本文化的著作,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。简单说来,手抄本文化与印刷文化最本质的区别,在于前者的流动性,从抄写者到编辑到读者(这些身份往往是并存的),都参与了抄本的制作和——更重要的——创作。我认识到传统的考证如何可以被提升到理论的层次,从而获得一种新的生命,与当代世界接轨。对文本多重性的认识,只能发生于后现代文化之中。

近年来读的杂书里,印象格外深刻的有迈克·塞尔斯译注的古典阿拉伯诗歌,《沙漠之痕》,和《欲望的驿站》。古典阿拉伯诗歌似乎较其他古典文学都更不容易翻译,看过许多英文译本,都觉得不成其为诗。塞尔斯本人是学者,也是诗人,他的译文,是我见过的阿拉伯诗歌译文里最出色的。

谈到阿拉伯古典文学,不能不提到伊贲·哈赞,中世纪西班牙伟大的学者和诗人,苏轼的同时代人。几年前,我在写《赭城》一书的时候,读了他的著作《鸽子的颈环》。伊贲·哈赞于公元994年出生在

西班牙南部柯尔多巴的一个贵族家庭。他的少年时期是无忧无虑的：他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和他交游的也都是柯尔多巴的贵公子。后来，哈赞的父亲因政治原因被投入监狱，并于1012年去世。次年，北非的柏柏尔军队入侵柯尔多巴，哈赞开始流亡。他死于1064年8月15日。

《鸽子的颈环》写于1027年。这是一部奇异的著作。它描述了爱情的各个方面：它的性质，表征，源起，过程，直到它的终结。我们看到这样的章节：“关于一见钟情”，“关于眼语”，“关于进谗者”，“关于离别”，“关于憔悴”，“关于遗忘”。在这些篇章当中，哈赞对爱情的描述，既有个人体验，也穿插了亲朋好友的经历和传闻。总之，这部书，是给爱情的献礼，也是对逝水年华的追忆。哈赞让我想到庾信，想到张岱，也想到《东京梦华录》的作者。也许，正因为这部书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，即使在表达强烈情感的时候，它的文字也还是具有一种优美而宁静的力量，就好像柯尔多巴开在十二月的素馨花，散发着寒冷馥郁的芬芳。

下面是《鸽子的颈环》中，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：

有一天，齐亚德·伊赞·阿比·苏扶严问他的大臣：“谁的生活是最快乐、最幸福的？”

“信徒们的领袖。”大臣们回答。

6 留 白

“但是，库拉什给他带来的烦恼和不幸，又该怎么说呢？”

“那么，就是陛下您自己了。”大臣们说。

“但是，”齐亚德继续发问，“卡拉基人给我找的麻烦，还有帝国的边疆给我带来的忧虑，又该怎么说呢？”

“尊敬的陛下，那么照您看来，谁才是天下最快乐，最幸福的人呢？”

他答道：“一个善良的人，娶了一个善良的妻子，两个人不愁吃穿，他满足于她，她也满足于他；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。”

故事最后的话，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的《击壤歌》。天下大治，百姓无事，田间老父击壤而歌，观者叹息道：“大哉帝德！”老父回答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于我何有哉！”

一个普通人，满足于自己的生活，不觉得这和君王的统治有什么相干。假如统治是成功的，那么，这也正是应当出现的情形吧。

秋水 记于波士顿寓所，时年三十五岁



从红楼到绮楼

倘使一个文化有系统地洁癖下去，最终恐怕只落得一个妙玉的结局。

宋代诗人陈与义(1090—1138年)写过这样一首诗:

杨柳招人不待媒,
蜻蜓近马忽相猜。
如何得与凉风约,
不共尘沙一并来。(《中牟道中》其二)

貌似简单的一首绝句,带来很多问题。诗人道中所见,想必远远不止杨柳、蜻蜓、凉风、尘沙,为什么单单挑选出这几个意象?杨柳与蜻蜓,又和诗人对凉风的祈愿有什么相干?这种愿望本身——不携带尘沙的凉风——暗示了什么?这些问题不仅牵涉到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古诗,也牵涉到一种在近现代格外流行的文化思想模式。

我们首先注意到,杨柳和蜻蜓,本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,在诗中却构成了反差。杨柳招人;蜻蜓本来飞近,却突然相猜而避开了。这也许是因为杨柳本是无情之物,既然无情,也就全无机心;蜻蜓之所以猜疑,令人想到《列子》里面关于海鸥的寓言。海鸥原本和人亲密无间,一旦人产生了机心,海鸥也就再不肯落下了。在这首诗中,正是诗人自己的机心,造成了大自然的异化:杨柳的牵缠,从杨柳来说是无心的,从诗人方面来看,却好像是在有意招惹,而且因为“不待媒”之故,是一种不合适甚至不合法的举动,出界的挑逗。诗人这样

的多心——把人类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自然界——造成了蜻蜓的远离。

然而,在杨柳/蜻蜓和凉风/尘沙之间,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联。是什么使得诗人发出这样情感强烈的祈求——“如何得与凉风约,不共尘沙一并来”?诗人没有告诉我们。这首诗的评论者,也从来对此避而不谈。也许,是因为评论者都以为这首诗是“写实”的,换句话说,凉风和尘沙是诗人对“现实世界”的反映,无需作出更多的解释。但是,诗的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,因为,如前所言,现实世界的中牟道中,应该充满了各种各样可以观看的景象,为什么偏要谈到杨柳、蜻蜓、凉风与尘沙呢?从蜻蜓到凉风的转折,又该如何解说呢?

在这首诗里,凉风与尘沙构成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,这种对立不是平等的,而是具有等级性的差异。尘沙扑面,是凉风造成的,因此,尘沙是第二性的,是果;凉风是第一性的,是因。在概念的层次,因比果具有更大的重要性;同时,在价值的层次,凉风舒适而尘沙肮脏,因此,凉风的价值也大于尘沙。这样的价值判断,基于所谓的常识。但是,问题又来了:谁的常识?我们意识到,这一“常识”其实代表了人/诗人的价值观念,不是杨柳的或者蜻蜓的,更不是凉风的或者尘沙的。诗人在作出区别,这种区别不仅仅发生在认识论层次上(凉风不同于尘沙),更发生在价值判断层次上(凉风好而尘沙不好)。这把我们带回到老子、庄子与列子的哲学领域:世界的堕落,正是由具有

等级差异的分别造成的。我们回头看到，凉风吹起杨柳，柳枝拂面，令诗人感到懊恼，发出“招人不得媒”的埋怨；而就在诗人用一己的和人类的道德观念来看待自然界的时候，蜻蜓已经感知到了诗人的机心而倏然远离。但诗人依然不悟，渴望凉风可以“不与尘沙一并来”，没有想到却是这样的渴望，使世界变得不再完美。

中国阅读传统喜欢把一篇作品置于叙事语境。陈与义是在服孝期满前往都城任职的路上：“京洛多风尘，素衣化为缁。”评论家们又很少提到《中牟道中》两首绝句里面的第一首：“雨意欲成还未成，归云却作伴人行。依然壤郭中牟县，千尺浮屠管送迎。”佛寺与坏郭，向行人展示无常和虚空。“尘”是佛教的概念，然而六尘者不存在于外，它们不过是人的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感觉和认识的六种境界而已。也许竟不是京洛多风尘，而是诗人太在意风与尘的分别了。

陈与义的绝句标志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时刻。它表现的是一种洁癖，一种对于“纯粹”的追求。据十二世纪的笔记《道山清话》记载，北宋邵尧夫曾说过一段话，颇有意思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人会好洁成病，邵尧夫答道：“胸中滞碍而多疑耳，未有人天生如此也。初因多疑，积渐而日深，此亦未为害。但疑心既重，则万境皆错，最是害道第一事，不可不知也。”邵尧夫的话固然没有错，但就连这样具有自觉的议论也是相当“宋人”的。宋代文化不从改朝换代的十世纪开始，而从十一世纪开始；陈与义的诗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中可以更看出